■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

在“石敢当”前头加上“泰山”两个字，合称“泰山石敢当”，这是石敢当信仰与泰山招魂信仰在精神层面上合拍，从而结出的硕果……

当“石敢当”遇到“泰山”

□ 本报记者 卢 昱

在山东各地，不论在繁华的城镇，还是在宁谧的农村，经常可以看到一块刻有“石敢当”或者“泰山石敢当”的石头，镶嵌在墙壁里或独立于墙下。

这种用于镇宅、压灾、驱邪的器物，或石质、木质，或砖质雕刻；有的上部勾勒有兽头，或狮或鬼或狗或人，大都面部狰狞可怕；字体也是五花八门，楷隶行草，还有歪歪扭扭石匠自刻的。

一块刻有“泰山石敢当”的石头，不论取自哪块山头，放置在哪个巷口，都串联着人们的精神追求，寄托着他们在文化传统大潮中的价值取向……

灵石崇拜的遗俗

考究起来，“石敢当”的源起与石头崇拜有关。在第六版《辞源》中，“石敢当”有如下解释：旧时住家正门若正对桥梁、巷口，常立一小石碑，上刻“石敢当”三字，以为可以禁压不祥。《急就篇》卷一：“石敢当。”颜师古注：“敢当，言所当无敌也。”崔灏《通俗编·居处》引《继古丛编》：“吴民庐舍，遇街衢直冲，必设石人或植片石，镌‘石敢当’以镇之，本《急就篇》也。”又引《墨庄漫录》，谓得大历五年“石敢当”刻石，则此俗唐代已有。

《辞海》提及的《急就篇》，其实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记载“石敢当”的书籍。这《急就篇》本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，因首句有“急就”二字而得名，全书无一字重复，由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。“急就”有很快可以学会之寓意。

为《急就篇》作注释的有唐代颜师古和宋代王应麟两个版本。其中，颜师古在注解“师猛虎，石敢当，所不侵，龙未央”这一句时，有这样的见解：“卫有石碏、石买、石恶，郑有石癸、石楚、石制，皆为石氏。周有石速，齐有石之纷如，其后以命族。敢当，言所向无敌也。”

颜师古指出“石”是古代就有的姓氏，并列举了姓石的几个名字。他对“敢当”作了解释，意思是能够勇敢地面对敌人，但没有说历史上有过“石敢当”其人。就像石敢当前一句出现的“师猛虎”一样，一方面是说师姓，同时也暗含像猛虎一样；“石敢当”也遵循此理，一方面指石姓，同时也可能含有石头敢当之意。

追溯到西汉乃至以前，“石敢当”尚未有具象。正如当代学者刘锡诚认为“石敢当是古代灵石崇拜的遗俗，与人无涉”，“石敢当”之语应解释为灵石可抵挡一切。

其实，围绕石头的崇拜早在石器时代，就已风行。当时的人们把外界的一切东西，都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有生命、有意志的活物，觉得万物有灵。而在物我之间，更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连接着自己和群体。人们把天然的石块磨制成各种各样的形状，用于狩猎、宰杀禽兽、切割兽皮、砍树等。由此，原始人对石器怀有特殊的感情，死去时往往把石器作为随葬品。

灵石崇拜是古代先民一种信仰观念，石最坚硬，石可取火，石可通神。正如西方巨石阵的灵石崇拜，我国自古就有着很多的灵石崇拜故事，如早期的“女娲炼石补天”“燧人氏钻木取火”，以及祭祀高禖石等活动。在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所著《中国神话史》中，曾介绍山石崇拜的遗存。如在《述异记》上说：“桀时泰山山走石泣。”这就带着早期原始社会活物论神话的意味。《艺文类聚》引《随巢子》说：“禹产于昆石，启生于石。”《西游记》说孙悟空从花果山仙石中迸裂降生出来，这种“石头能生子”的传说也是该活物论时期神话思维的产物。唐代山东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说：“莱子国海上有石人，长一丈五尺，大十围。昔秦始皇遣石人追劳山不得，遂立于此。”灵石崇拜也出现在祭天地、祭山川、祭祖祈育等仪式中。在浙江、辽宁等地，还有用巨型石块做墓壁并封顶的石棚墓。

习俗在信仰的支配下，逐渐沉潜，数百上千年传承下来。在清人倪璠《庾子山集注》中，当注解南北朝文学家庾信《小园赋》之“镇宅神以埋石，厌山精而照镜”句时，引用西汉刘安《淮南毕万术》提及的“曰埋石四隅家无鬼”一语；与庾信同时代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亦言，“十二月暮日，掘宅四角，各埋一大石为镇宅”，都提及用石头镇宅的习俗。

石敢当，镇百鬼

历史文化学者崔广庆认为，至迟在唐宋时古人就把“石敢当”三字书写在石头上，来驱邪、抵冲、镇鬼，这和现今“泰山石敢当”的功能已无区别，惟一的差别就是“泰山”二字未曾使用。

现存最早的“石敢当”实物，是一块于福建省福州市郊高湖乡江边村发现的宋代石敢当。它高约80厘米，宽约53厘米，上面横书“石敢当”三字，其下直书：“奉佛弟子林进晖，时维绍兴载，命工砌路一条，求资考妣生天界。”从碑文可以得知，这是一个佛教俗家弟子林进晖在为死去的父母做功德，命工人修建道路，并在路边竖立了石敢当，旨在镇路护道，以超度父母往生天界。

在宋代，“石敢当”仍是一块镌刻着三个字的普通石头，而当石头有了人的属性，各种各样的神话、传说便应运而生了。传说故事的大众化、地方化，使得石敢当信仰和习俗有了更强的传播力，愈发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。

在明代，曾任日照县知县的杨信民写了一本叫《姓源珠玑》的书，说“石敢当”是五代时的一个勇士，为保护后晋高祖石敬瑭，在格斗中死去。

章丘“大夫石”

查阅《旧五代史》可知，《姓源珠玑》说的是后唐皇帝愍帝因潞王李从珂造反而出逃，与当时担任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在卫州相遇。唐愍帝的左右想谋害石敬瑭，石敬瑭的心腹将领刘知远就派了一个叫“石敢当”的勇士，袖子里藏着铁锤，随侍在石敬瑭的后面。

果然，唐愍帝和石敬瑭议事中发生冲突，“石敢当”为保护石敬瑭与唐愍帝的左右侍卫格斗而死。后来刘知远带人拥入，杀光了唐愍帝的左右，并把唐愍帝软禁起来。若干年后，石敬瑭做了皇帝，就是历史上那个为了取得契丹的支持，自称“儿皇帝”的后晋高祖。

在正史中，涉及石敬瑭这段往事时，有如下记载：会愍帝出奔与晋高祖遇于途。遂俱入卫州泊于邮舍。愍帝左右谋害晋高祖，帝(指后汉高祖刘知远)密遣力士石敢袖槌立于晋高祖后。及有变，敢拥晋高祖入一室，以巨木塞门。敢寻死焉。帝率众尽杀愍帝左右，遂免晋高祖于难。

与《姓源珠玑》不同，这位勇士名叫“石敢”，而非“石敢当”。而为无耻的儿皇帝卖命而死的人，怎么会得到民间崇拜，奉为驱鬼避邪的神灵呢?由此可以断定，“石敢当”为五代的勇士之说，不可凭信。

而在晚清经学家俞樾的《茶香室续钞》中，记载了这样一则关于“石敢当”的资料——庆历中，张纬宰莆田，再新县治，得一石铭。其文曰：“石敢当，镇百鬼，魇灾殃，官吏福，百姓康，风教盛，礼乐张。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。”今人家用碑石书曰“石敢当”三字镇于门，亦此风也。按此则“石敢当”三字刻石始于唐。

通过俞樾的记载可知，早在唐代的福建莆田就已经出土“石敢当”刻石，比五代石敢的事要早一百多年。这一方面证明了《姓源珠玑》所说的来历是错误的。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：最初的“石敢当”刻石可能作为石铭被埋在地下。

在敦煌文献中，也可找到一些埋植刻石的记载。著名民俗学家高国藩在其《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——中国民俗探微》中，对唐开元年间流行的镇宅石民俗有如此解释：“凡人居宅处不利，有疾病、逃亡、耗财，以石九十斤，镇鬼门上，大吉利。”“人家居宅已来，数亡遗失钱不聚，市买不利，以石八十斤，镇辰地大吉。”

由此看来，埋植石头的风俗演变比较清晰：从西汉乃至以前，民间便在房屋四隅埋坚硬不易腐朽的石材，以达到镇宅避鬼的预期；后来慢慢演变发展为在石头上镌刻“石敢当”三字铭文，加强石头镇邪的声威。而最初是埋在地下，进而演变为制成石碑立于地上，在街巷家屋要冲之处，用来抵挡妖魔鬼怪。

“东岭山下大石即我”

从把“石敢”有意无意当成“石敢当”，再到把石头上的文字演绎成具体的人，有着民间文学的想象和创造。而在“石敢当”前头加上“泰山”两个字，合称“泰山石敢当”，这是石敢当信仰与泰山招魂信仰在精神层面上合拍，从而结出的硕果。

“泰山”与“石敢当”的强强联合，与泰山文化的传播是分不开的。汉代以来，民间就把泰山作为制鬼之山。在范晔所撰《后汉书·乌桓传》中，有如下记载：“使犬获死者，神灵归赤山，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；如中国人死者，魂神归岱山也。”

在现存史料中，“泰山石敢当”之称呼最早见于明代中后期。明代著名学者、文学家杨慎在《升菴集》中言：石敢当本《急就章》中虚拟人名，本无其人也。俗立石于门，书“泰山石敢当”，文人亦作《石敢当传》，皆虚辞戏说也。昧者相传久之，便谓真有其人矣。呜呼，不观《考工记》不知钟馗之讹；不观《急就章》不知石敢当之诞。

对于这两个词组为何在明代结合，有各种猜测。崔广庆认为，自元代以后，泰山在官方的地位不断下降，泰山不再是帝王们的专属品，尤其是洪武三年的诏书，使得“泰山”二字的使用进入寻常百姓家，“石敢当”与“泰山”开始结合，在明代中晚期开始出现“泰山石敢当”这种新的镇宅方式。

“尤其是明清以来泰山不再添加封号，皇帝也不再举行封禅大典。泰山在官方祭祀系统中的地位不断降低，而民间的习俗信仰就可以大胆使用‘泰山’来崇拜。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东岳大帝信仰的普及、泰山老奶奶信仰的普及和泰山香社的活跃。泰山的信仰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，利用泰山来驱除邪患的方式当然也会流行，而历史上早就流行的‘石敢当’这种灵石崇拜方式，怎么能舍得‘泰山’这个既没有官方限制而又颇有灵验和神圣的名字？”崔广庆阐释道。

到清代，“泰山石敢当”五字的形式基本定型，如清初王士禛之《古夫于亭杂录》中记载：“齐鲁之俗多于邨落巷口立石刻‘太山石敢当’五字。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。北人谓医士为大夫，因又名之曰‘石大夫’。”

石头变成人，这种传说，在山东不乏流传。据章丘文史专家翟伯成介绍，在章丘东部有一山峰叫东岭山，在山西面鸡冠岭上有远近闻名的大夫石，其状如人像。慈眉善目，颇像一老者。

据《山东通志》载：“杈山亦名东岭，长白山迤南之高峰也。有石高丈余，化为人，行医于章丘。明嘉靖初，自号石大夫，假星命至渭南。见刘凤池即拜曰：‘我邑父母也’。刘果登第，令章丘。访之不得，石见(通‘现’)梦曰：‘东岭山下大石即我也’。凤池立庙祭之。病者往祷，辄托之梦寐，医无不愈。”

“泰山石敢当”的习俗，从幼年到少年，再到成年，已经发展了上千年。这么久的历史传承中，有着风水理论的推动。形状各异的石头，承载着驱邪避煞的任务。在泰安当地的传说中，“石敢当”也成了一位活灵活现的年轻人。

相传，石敢当住在泰山脚下的村子里，靠打柴过活。他同情弱者，力气过人，从师学习武术。有一天，他上街卖柴，看见王财主贴的告示：我家来了妖怪，谁能降伏就把女儿嫁给他。原来，王家一到晚上，就有一妖怪驾着狂风吆喝着抢王小姐。富有正义感的石敢当决心为民除害，当晚他持宝剑藏进王小姐的闺房。当妖怪来时，他挥起宝剑，大叫道：“泰山石敢当在此。”妖怪大吃一惊，一溜烟跑了。

后来，石敢当和王家小姐结了婚，过着幸福的日子。但逃走的妖怪又跑到别的村子做坏事去了。村民们听说石敢当能驱魔除怪，纷纷来请他，但当他赶到时，妖怪又逃到别处。

石敢当的妻子出主意说：“把你的名字刻在石碑上，立在村口人家的门前，不就可以赶走妖怪，保证那地方的安全了吗？石敢当马上把这个主意通知了各个村子，从此不管哪个村子都立起了写着“泰山石敢当”三个字的石碑，妖怪从此也就不见了。

偏偏泰山石敢挡

“石敢当”变成勇士或大夫，天生带着有求必应的属性，迎合了人们的心理。数百年前，人们对某些自然社会现象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，加上社会保障之不足，便信奉神灵，并将其幻化成人形，希冀他（她）们对人间的疾苦了如指掌，出手相助。

石敢当传说的版本很多，多在清代开始丰富起来。相传，康熙年间有位叫拜音达礼年的将军，他的住宅与佛寺相邻，感觉居住起来很别扭。后来他去江西，顺便到龙虎山求教。有个道士告诉他，这是住宅有凶煞的缘故，用文字镇之则吉。就在纸上写了“泰山石敢当”五个大字给他，题款是：“纯阳子书。”将军既惊又奇，连连道谢，却找不到道士踪影。后来，将军把这几个字勒石，嵌于庭院东廊上，日子从此就太平了。

泰安城南湖公园的泰山石敢当雕像

上面的传说，与道教有关。还有一则更为离奇的传说，在上个世纪初叶出版的杂志上风行：康熙年间，广东徐闻县有几任知县，到任没有几个月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。后来，来了一个姓黄的知县，他请了一位有名的风水先生来衙门察看。风水先生看过以后，说县城里的一座塔的影子正好落在知县的公座上，前几任知县都是顶不住宝塔的压力而死的。他建议在衙门的正面，建一座“泰山石敢当”的碑，以泰山之力抵抗宝塔的压力。知县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，建了碑，此后果然平安无事地结束了任期。

在清代作家李斗所著奇书《扬州画舫录》中，有以下记载：“东折入河边，巷中旧多怪，每晚有碧衣人长四尺许，见人辄牵衣索生肉片，遇灯火则匿去，居人苦之。有道士乞缘，且言此怪易除也，命立‘泰山石敢当’，除夕日用生肉三片祭之。以法立石，怪遂帖然。”

以上三则故事，都是以石头的威力来震慑鬼怪。在泰安当地，却流传不同版本的传说。

第一个版本是“挚友说”。话说，泰山与石敢当原为同窗好友。泰山家庭富裕，学习刻苦，考中了举人。而石敢当不但落榜，还在外过流浪生活。有一次石敢当讨饭到泰山府，被泰山留住府上，以礼相待。数年后，泰山因公务外出，半年未归，石敢当自尊心很强，以为自己住的时间长了，泰山故意躲起来不见，便“永别了”。泰山办完公务回府后，听说石敢当死了，万分悲痛，也自尽了。因为泰山与石敢当情同一人，后人纪念他俩，将泰山与石敢当的名字合在一起，即“泰山石敢当”。

第二个版本则攀附上了皇帝。传说泰山石敢当确有其人，乃桥沟石氏家族。此人早已成为人们崇拜的神灵，汉武帝来泰山封禅时，正值大汶河洪水爆发，幸亏石敢当由仙界及时赶到，救了他一命。

除了汉武帝，另外一位经常在山东传说中出现的皇帝也出马了。话说唐太宗骑马到泰山回马岭时，一看到马蹄盘，实在上不去了。他又好奇，非上不行，结果绕着道走，临走时说了一句：“我从长安来，逢山开路，遇水造桥，没有挡住我的，偏偏泰山石敢挡。”借这个音，便顺势有了“泰山石敢当”。

“泰山石敢当”的传说总是乱花渐欲迷人眼，带有时代性。鸦片战争后，受西方科技文明的浸染，石敢当等民俗被视为迷信。“百日维新”中，康有为上书光绪帝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》，其中论及石敢当等民间信仰：“惟中国尚为多神之俗……若夫木居士之一株，石敢当之一片，亦有无穷求福的人。”凡此皆应“立命有司，立行罢废”。

一百多年前，包括泰山祀典在内的自然神崇拜被政府废除。而在1933年作家易君左先生在所作《定泰山为国山刍议》中陈述泰山精神，特地举出“泰山石敢当”凝聚民族精神：“凡此赞仰泰山之伟大尊严者，其例甚多，如泰山北斗，示景仰人物之崇高……乃至‘泰山石敢当’之意义，亦以表示泰山为生民生活之保障。盖吾国国民数千年来，所拥戴之一大自然现象，厥为泰山。社会生活，心理信仰，咸系于此。”

·相关阅读·

在抗战时，民族危亡的背景下，传统的“泰山石敢当”民间信俗置于时代激流的峰头浪尖，一变其镇宅护路的原有形象，开始充任凝聚人心、鼓舞斗志的象征物。

以戈待敌 泰山敢当

□ 本报记者 卢 昱

“泰山石敢当”习俗的魅力，极具时代性。在1926年7月1日的《申报》中，有个类似于当下段子的笑话：某当铺墙上，题有“泰山石敢当”句。一日，有滑稽者负大山石一块，晃晃悠悠到了当铺内，问当铺伙计：“是石可典钱几许?”当铺伙计叱之曰：“你莫非有神经病吧，故意拿这个物来典钱?”滑稽者笑曰：“贵当铺墙上，不是题有泰(通‘大’)山石敢当一言乎?更何况我这是泰山石，你们没有理由不要吧?”

我国很多地方的“泰山石敢当”五个字上方常刻有老虎（亦有其他）图案，同是为了起到辟邪的作用。《山海经》中载：“沧海之中，有度朔之山，上有大桃木，其屈蟠三千里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，万鬼所出入也。上有二神人，一曰神荼，一曰郁垒，主阅领万鬼。善害之鬼，执以苇索而以食虎。於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，立大桃人，门户画神荼、郁垒与虎，悬苇索以御凶魅。”从这段话可以得知，老虎具有吃鬼的能力，故而古人把老虎视为辟邪的动物。端午节，大人会送给小孩布老虎作为礼物，就是以老虎镇克五毒。

类似老虎头的图案，在四川一带被称为“吞口”。吞口不是泰山石敢当，虽然西南诸省有写“泰山石敢当”的吞口，只是因两者在功能上相似，却不构成从属关系。从考古资料可以论证吞口的历史远远早于石敢当。

在1940年《说文月刊》第9期上刊发了考古学家卫聚贤的《泰山石敢当》一文。卫聚贤回忆自己的故乡在墙壁衔长约一尺、宽约五寸之石，上刻“泰山石敢当”五个字。据说地中有一支土箭射过去，射到谁家给谁家不吉利，将这“泰山石敢当”衔在墙上，就把土箭挡住了。此时，卫聚贤尚未深究，直到赴川北、川西考察，在汶川看见“泰山石敢当”的石碑上便雕有兽头，才注意了这个问题。

在重庆过江到弹子石时，卫聚贤在道旁一家人门上正中悬一木瓢，瓢背上用颜色画一如戏台上花脸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头，大口吐舌。他知此为民俗中的辟邪物，但未询人作何用途。到汶川时，卫聚贤在路上看见人门口竖一石碑，碑上刻“泰山石敢当”五字，碑上端刻有一兽头，兽为大口吐舌。但在路中过去，他未仔细查看，不过因已入羌民区域，故各事留意，待到汶川县北关，亦见一家商号门口有一，问其他人名此曰“吞口”。言此神最灵，而且比一切神的神力都大，四川各地人奉此神最多。

到了1940年中秋日，卫聚贤到新都县桂湖游览，由桂湖公园至文庙的一条马路两旁，各有一碑，上端雕为狗头。但在峨嵋县双福镇及泸县澜波渡所见之吞口，其相凶恶，口张甚大，舌出甚长，口中横衔一剑，而泸县澜波渡的有新近用鸡血洒在此碑上，并且有很多鸡毛贴在碑上。回到重庆，卫聚贤发现在李子坝办公的交通银行隔壁，亦有此碑，上端雕狮子头，舌不吐出，项下有两爪露出，下刻为“泰山石不敢当”六个字。

在嘉定时，卫聚贤曾以此事询问热衷于四川各地汉崖墓及化石的杨枝高先生。杨枝高说“吞口在汉代已有”，还取出于1928年6月在绵阳白云寺发现的汉崖墓上一个吞口拓片赠给卫聚贤。“此图的吞口为两歧角，似乎是鹿，当额中又有一双横目眼睛，下面并没有刻字，这与弹子石将木瓢悬空在门上相同。”卫聚贤回忆道。

为何这种吞口上鹿虎狮狗均有，还和“泰山石敢当”联合起来？卫聚贤以为这由狗的崇拜而来。在读音上，四川人名此为“吞头”，当是狗的长音。再就是羌民在古时以狗为图腾，后信奉以狗为灵的神，故于各地雕吞口，但得罪了这个狗神，没有方法可以免祸，惟有大山上的石头可以堵挡得住。因为羌人原居四川，有时北过岷山的大山，但过山后多为汉人所征服，故汉人移居四川者，于吞口口中横穿一剑。有截杀意，便欲刻“大山石敢当”五字。而“大”字古音读为“太”，有人刻成了“太山石敢当”，后人误为山东泰山的人名石敢当者可以镇邪，因此刻成“泰山石敢当”了。

文化融合，让泰山石敢当和吞口结合。而在抗战时，民族危亡的背景下，传统的“泰山石敢当”民间信俗置于时代激流的峰头浪尖，一变其镇宅护路的原有形象，开始充任凝聚人心、鼓舞斗志的象征物。画家高龙生发表在《抗战画刊》1938年第22期上的画图《泰山石敢当 勇士敌难冲》，把泰山石敢当绘成一位抗日战士的形象。1942年夏，中国远征军由缅甸溃败时，失散士卒多赴阿佤山区抗击日寇，在阿佤山建立抗日游击队。孤军在其据守山地，镌刻泰山镇石名号，用以鼓舞士气。今云南孟定尖山西南尚存阿佤山游击队所留大字石刻，其文曰“以戈待敌”“泰山敢当”。如今读来，依旧荡气回肠！

卫聚贤所藏吞口拓片